

# 由了解世界到展示中国

外语学科的发展历程

□ 肖宏宇 沈凌

中央党校外国语言与文学学科（以下简称“党校外语学科”）体现了党对“胸怀天下”世界观的坚持，始终担负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了解世界”的基本任务，并随着党的建设和党校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党校外语学科因时而立，因势而起，因需而变，在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过程中不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作用。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对内翻译实践为主， 兼顾对外翻译传播

党校外语学科诞生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追求真理的革命实践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翻译经典著作是必然途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专门提到要对理论著作的翻译制定一个计划，指出急需开始编译的工作之一是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1927年4月29日，陈独秀在党的五大上的报告中强调，宣传部要扩大翻译工作。报告本身也附有英文翻译稿。192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央党校的筹办工作，除了谈及副教务主任和事务主任的工作外，专门指定由两位同志担任翻译。

1933年3月，中共中央局在苏区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便是中央党校的前身。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通晓外语并具有留学海外的背景。任弼时曾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负责翻译俄语书籍和俄语文章。张闻天曾先后赴日本、美国勤工俭学，他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颇高，并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党校唯一的政治教员”成仿吾曾留学日本，并赴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等从事革命活动、主编杂志。先后任党校教务长和副校长的冯雪峰也是颇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家。党的这种人事安排为党校外语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党校外语学科基本

形成了既注重对内翻译实践，又拓展对外翻译传播的学科框架。一方面，党校注重马列经典著作的对内翻译与传播，同时开启了外语人才的培养。1938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1941年改名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中央党校成为第三部），特设了编译部。这个机构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还专门开设了俄文讲习班，参加讲习班半数以上的学员都能做一些翻译工作。《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今年要首先校阅党校所用全部翻译教材及译完西方史两册，以应急需。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另一方面，党对翻译活动的精心组织和对外翻译传播实践的成功为党校外语学科的后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强化了党校外语教师要平衡外译中与中译外的两种翻译实践的意识。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翻译有机地融入 党校教学与科研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央党校始终坚守和传承翻译工作，通过讲稿翻译、文献资料编译和经典著作校译，翻译工作逐步成为党校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组成部分。1948年到1955年间，马列学院的三任院长刘少奇、凯丰、李卓然都有留学经历，外语素养与理论水平都很高。凯丰曾留学苏联三年，是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担任过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的杨献珍也曾翻译过《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

1949年马列学院进驻北京后，随着中苏关系不断紧密，苏联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专家学者和代表团，其中就包括到马列学院的苏联专家。1950年至1956年间，来马列学院授课的苏联专家达60余人。由于大量苏联专家的到来，迫切需要俄语翻译参与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1953年9月，当时马列学院组织机构与编制表中共有六个教研室和一个俄文翻译室（编制共计21人）。俄文翻译室下分六个翻译组：马列主义基础翻译组、政治经济学翻译组、哲学翻译组、历史翻译组、新闻翻译组、党建翻译组，主要任务就是翻译当时在校任教的苏联专家的讲稿。

1956年党校扩大校务会通过《关于翻译和翻译工作的调整问题》，党校编译室随之成立，其工作任务主要包括翻译教学资料，翻译与教学和研究相关的理论书籍和论文，负责外国专家的工作以及进行俄文进修。在此期间，党校的翻译人才大量参与了校刊编辑工作，承担了很多外文资料编译和翻译工作，其中《向专家学习》主要是翻译苏联专家讲稿，《教学参考资料》主要是翻译和编译教学科研相关的各语种外文资料。

后来，郑伊倩等德语教员参加了以成仿吾为顾问的马恩经典著作校译工作小组，协助从德文原版重新校译马克思恩格斯的五部著作《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其部分书信。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 传承发展翻译工作 同时外语教学乘势发展

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后，党校的外语人才积极参与理论研究资料的编撰和翻译工作。改革开放初期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其中专门设立了外文资料翻译室，负责党校内部研究刊物《理论研究资料》（校内参考）中的译文专栏。

为适应党校在改革开放时期培养研究生的需要和干部自身外语学习的需要，在原有翻译室外语人才的基础上，中央党校又引入了很多

外语人才，并专门成立教研室。从此，党校外语学科从原来的以翻译为主逐步向翻译与外语教学并重发展。

1983年，外国语言与文学教研室成立。教研室最初归属理论部，1985年成为校直属机构。1991年春，外语室与语文、历史两个教研室合并为文史教研部。2011年，教研室更名为外国语言与文化教研室。

教学主要包括研究生外语教学和干部外语培训两大部分。1981年起，党校开始招收研究生。校委会召开外语教学专题会议，出台《中央党校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外语课进行了专门规定。干部外语培训包括了进修部、培训部、函授学院、成人教育学院、业余大学、党校组织的校内教师培训班等外语教学工作。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作为选修课的外语课对在党校学习的中青年干部的外语扫盲和外语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很大作用，受到进修部、培训部学员的欢迎。2001年至2013年期间，原国家行政学院也相继承办了八期“省部级干部英语强化班”，共培训110多名省部级干部。

在科研上，外语教师不仅参与了党校相关课题的译介和马恩著作的校译，以及涉及中东和苏东地区教学资料的编译，还出版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向的几十部学术译著，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论欧洲共产主义》《金藤》《通产省与日本奇迹》《走向澄明之境——卢梭随笔与书信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媒介社会学》《民族与民族主义》《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等。多名教师获得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通晓俄语和孟加拉语并翻译了泰戈尔的多部作品的董友忱获得了印度政府授予的泰戈尔纪念奖章的殊荣。精通俄文翻译的李钧学是俄译《周恩来文选》等重要文献的定稿人之一。何沅康积极开展了中国文化作品的对外翻译，英译了《大学中庸》《孟子》等文化经典。

这一时期外语教师们积极参与校内外外的对外交流工作，多次担任党校出访及来访的外事口笔译工作，参与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1996年8月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等国际会议的口译工作。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跨学科外语教学和 对外翻译传播能力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中央党校在建设“一流学府”过程中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外语教学更加注重学生学术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外语室遵循“因材施教、注重能力”的原则，持续渐进地对研究生公共外语进行改革。这一时期教学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设计适合党校学生需求的跨学科外语课程，引导学生将外语学习与专业学习、学术科研和跨文化交流相融合，形成了“基础英语+应用英语+英美文化讲座”的硕士生英语教学框架和“语言技能+学术英语+跨文化课程”的博士生英语教学框架，尝试实行“通选+限选”的授课模式，出版教材《博士生学术英语综合阅读》。在党校主体班课堂上，本学科教师也先后开设“美国文化政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政策比较”“法国大革命の启示与意义”讲座课。

建党伊始，翻译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重要途径。新时代以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同样离不开翻译，翻译能力和翻译人才队伍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因此，党校外语学科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传播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从比较语言学和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尝试描述和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与党的政治文献翻译传播的规律和特征。近几年来，外语学科的科研逐步转向翻译传播学，以期更好地为新时代传播好中国声音建言献策。

（下转4版）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负责人推介

#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础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 王天义

王天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经济研究》《中国金融》《求是》等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先后主持完成4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多项中央党校重点课题，有多项成果获奖。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研究》是我2017年申报获准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批准号：17AJL003），于2022年完成并以优秀结项。该项目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虽然自立项到结项历时5年，但却是我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缩影。回想起来，感受颇多。现就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谈几点思考，与大家共同探讨，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 重视经典著作研读， 贵在坚持、坚守、坚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我个人体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逐字逐句认认真真地读，特别是对一些重点概念和重点段落一定要反复读，甚至要把它们背诵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吃透精神，掌握要领。有人会说，这样会感到枯燥乏味，读不下去。我认为，只要耐住性子读下去，自然会苦去甘来。比如，读《资本论》，人们总是说它的第一章最难读。我认为其实不然。这一章的标题是“商品”。研究资本为什么要从商品开始？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分析有机体要从细胞开始。那么什么是商品？商品首先是一个对人们有用的物品，物品对人们有用的属性就是物的使用价值。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别人的，因此必须进行交换而具有交换价值。要交换就要比较，要比较就一定有共同点。那么，不同商品相比较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各不相同的，生产不同商品花费的具体劳动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它们都不是共同点。把这两个不同点抽掉以后，不同商品就只有一种属性，即它们都是劳动的产品。马克思就把这种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称作价值。价值体现的就是人们相互交换劳



动的经济关系。最后，马克思对以上分析进行归纳：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然而商品的价值是以其使用价值为载体并通过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来表现的，这种通过物的关系来表现的人们之间相互交换劳动关系的社会即是商品社会。如果只看到物的关系而看不到其背后所掩盖的社会关系，就会产生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这里的分析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只要耐心读下去，一定会读出味道来。

第二步是对同一个范畴在书的不同章节的不同表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丰富内涵，进一步认识其本质属性。比如，对价值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认为是直接物质生产领域进行的劳动创造价值。到本卷第十四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要是生产产品必要的劳动，不管是不是处在生产环节都创造价值。再到本书第二卷，马克思又讲产品从生产到消费需要经过流通，在流通领域中如产品的运输、包装、分类、管理等付出的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在本书第四卷，马克思又认为，即使不提供有形产品而提供服务的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对比这些表述，我们就可以深化对价值概念的认识，即随着社会的发展、产品生产环节的增多，凡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不管是有形的物质产品还是无形的服务产品，不管是处在直接生产过程还是处在流通过程花费的劳动都创造价值。

第三步是从总体上认识把握主要范畴和主要理论。比如，只有劳动价值理论才是唯一科学的理论。研究商品价值的目的在于解释不同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这一商品社会最基本现象，这一现象用其他价值理论是不能作出正确回答的。如效用价值论是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流行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商品价值大小是由商品的效用或边际效用决定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不同使用价值是不能进行比较的，而且同一商品对不同的人又有着不同的效用，它们之间不具有相通性，用这一观点说明不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这一基本现象。再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要素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三要素即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事实上，资本主要是以机器设备等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机器设备是过去劳动的物化，物化劳动只能转移价值而且只有靠工人的活劳动的推动才能发挥作用，其本身是不会创造价值的。马克思认为，没有开垦的土地不包含劳动因而不具有价值，但可以具有价格。供求价值论也解释不了这一现象。供求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流通领域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虽然供求对商品价格有影响，但价值的创造是在生产过程而非流通过程进行的。所以说，承认不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形形色色的价值理论的分水岭。

## 着眼现实问题分析， 重在运用和创新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只有那些能够科学地解释现实问

题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用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解释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又能实现价值增殖的现实而走向破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之所以能够坚持到底，是因为他在批判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即通过对资本主义工资假象的科学分析，发现了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购买的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劳动力，按照劳动力价值等价交换资本家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权，工人在为资本家的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大于资本家给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所以，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并没有违背而正是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对工人进行了剥削。这一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特点，奠定了整个《资本论》的理论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优势。能不能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说清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二者是无法结合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通过自由竞争实现的资源配置方式，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实现私有化和自由化。那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基点是什么？我们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生产产生的两个条件的再认识，就可以发现已经包含着解决这一问题的锁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章讲到商品交换过程时指出，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这个时候，私有制还没有出现，不同的原始公社不是私有者，而是不同利益主体。在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只要存在着不同利益主体，人们之间的交换就必然要进行利益比较实行等价交换，进而就必然有商品生产。由于社会分工会长期存在，而不同利益主体又有多种存在形式和多种组合方式，市场经济也就有多种模式，既可以是私有制经济之间的组合即交换，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可以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甚至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有企业之间的组合即交换，在此基础上产生和发展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我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不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都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排斥私有制，同时也不排斥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它所要求的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定位明确、相互支撑、共同发展。

（下转4版）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学科史话——外语学科